

中文国际教育与传播的九大问题与思考*

王春辉

(首都师范大学 语言治理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摘要】尽管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中文的国际教育和传播仍然还处于萌芽期。有成就,值得自信;有挑战,更需面对。在分析问题时充分注意时间性与空间性原则、主体性与相对性原则。当前的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亟须在以下九个方面提升认知、完善实践:正当性之问;时空“六力”;中国式语言国际教育与传播;建构治理思维、开拓治理实践;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分;精准化导向;宏观调控和市场逻辑辩证统一;中文语言教育与传播与中文语言使用和生活;踔厉数字化与新科技助力。教育和传播的创新不是执着于新旧之争,其本质是“更适应条件”和“更符合要求”。“条件”和“要求”就是具体时间与具体空间交汇而形成的具体坐标点。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中文国际传播;中国式;语言治理;数字化;市场化;九大问题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3)01-0043-08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3.01.005

一、引言

截至 2022 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等 10 个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将中文作为官方语言,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81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①,开设中文课程的各类学校及培训机构 8 万多所,正在学习中文的人超过 3000 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人数近 2 亿。^②截至 2022 年底,全球共有 153 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 460 个孔子学院和 88 个孔子课堂。^③这应该就是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和传播的基本情况。^④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但是一方面“天下观”消解了语言传播意识,另一方面安土重迁观念和历朝消极的移民政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跨国移民。中国被动进入中国之外的秩序体系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而中国主动融入世界则基本上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换句话说,中文的国际教育和国际传播还处于萌芽时期。但是从某些角度来看,又可以说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创造了西方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才实现的成就。

有成就,值得自信;有挑战,更需面对。在《汉语:从陆地型语言到陆地-海洋型语言》^⑤和《历史大变局下的国际中文教育》^⑥两文中,笔者从整体性和系统性视角,运用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文

* 【作者简介】王春辉,男,山东莱芜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规划、汉语句法语义、语言文化传播等。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2020 年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重大项目“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体系创新研究”(20YH02A)。

① 根据新华社消息,2023 年 1 月伊朗国家教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介绍,从 2024 年起将中文课程纳入伊朗国民基础教育体系。这应该是一个最新的案例。参见: http://www.news.cn/world/2023-01/11/c_1129275101.htm。

② 参见: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1673958412661669&wfr=spider&for=pc>。接近 2 亿的数量排在英语(接近 11 亿)、阿拉伯语(2.74 亿)、印地语(2.58 亿)之后。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languages_by_total_number_of_speakersJHJcite_note-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618/mtbd/202206/t20220628_641460.html。

③ 孔子学院: <http://www.ci.cn/JHJ/site/GlobalConfucius/?key=0>。(查阅时间 2022 年 12 月 12 日)其中,亚洲 37 个国家和地区 132 所孔子学院、34 个孔子课堂,非洲 47 个国家和地区 64 所孔子学院、10 个孔子课堂,欧洲 39 个国家和地区 180 所孔子学院、27 个孔子课堂,美洲 25 个国家和地区 66 所孔子学院、17 个孔子课堂,大洋洲 5 个国家和地区 18 所孔子学院。

④ 国际中文教育与中文国际传播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区别明显的范畴,前者关涉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后者则关涉中文作为人类语言之一在中国之外的传播。本文的讨论对这两个范畴都有关涉,覆盖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的两个层面。

⑤ 王春辉. 汉语:从陆地型语言到陆地-海洋型语言[J]. 世界汉语教学,2019,(1): 3-19.

⑥ 王春辉. 历史大变局下的国际中文教育[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29-37.

的国际教育和传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展望。本文是在上述两文基础上的进一步思考：提出分析的两大原则之后，对九个重要方面进行了阐释。

二、两个分析原则

“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① 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的调整与变化，受到国内外多种力量对比和诸多因素影响的驱动。在讨论具体的问题之前，有两个方法论层面的分析原则有必要予以阐明。这两个分析原则看似大而无当，^② 实是分析根本。

(一) 时间性与空间性原则

时间与空间是宇宙和人类认知的两个基本维度，不同学科和不同学者对于时间和空间有不同的划分视角。但是又恰恰因为这两个因素是“大隐隐于市”的基础因素，所以在理论和实践的两端又往往会忽视它们。本文列出这一原则的目的，就是要强调两点：(1) 大道至简，纷繁复杂、变化游移的都是表象，至于底层逻辑或者说本质则往往是更为稳定和简单的；^③ (2) 中文的国际教育与传播需要时间和空间两端的进一步拓展甚至想象。

具体说来，在时间维度上应将国际中文教育和传播从当下时间延展到一个更长时间，比如黄仁宇所说的“三五百年”，或者布罗代尔“中时段”或“长时段”；在空间维度上应从物理空间延展到虚拟和价值空间、从战术空间延展到战略空间。这两个方向的拓展将在下文详细呈现。

(二) 主体性与相对性原则

这一原则主要涉及3个维度，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文与全球语言系统的关系、语言因素与整个因素系统的关系。

具体说来，考察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的相关议题，需要考虑中国、中文、语言因素的主体性位置和功能，但是也要考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为重要）他们的相对性位置和功能。所谓主体性位置和功能，就是剖析中国综合国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中文自身的教育体系和传播体系、语言因素本身在国际中文教育和传播中的意义；所谓相对性位置和功能，就是说中国整体实力的位置和功能是由全球国家系统中其他国家的位置和功能相对确立的，中文的位置和功能是由全球语言系统中其他语言的位置和功能相对确立的，语言教育和传播因素的位置和功能是由整体影响系统中其他因素的位置和功能相对确立的，^④ 这其中都包含着竞争与合作。

再做几点补充。(1) 一种语言在体系中的功能，很多时候是由其他语言所决定的：比如英语发挥着全球通用语的作用，那么其他语言就很难再具备此功能；而如果一旦其他语言具备了，那么英语的此功能将会萎缩。(2)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中文的核心依然如故，但是边缘却有了更大扩展。这一方面对中文的范围提出了新的认知，即越来越多的全球变体；另一方面也对中文的规范性提出了新挑战，即以中文的规范基本上针对国内情形，而现在则需要基于全球中文来考虑规范性问题。(3) 摆正主次关系，

① 司马光. 资治通鉴（第一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56：336.

② 所以被许多研究者刻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③ 一个最新的研究可以参看乔姆斯基（诺姆·乔姆斯基. 读懂我们自己：论语言与思想 [J]. 语言战略研究，2022，(6)：56-72.）。此外，特斯拉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阐述了基本原理或者说底层逻辑的价值。他说：“人们总会无法避免地把注意力放在制造装置的细节上，尤其当他们用这种装置去为某个不够成熟的想法做试验时。但是，随着对装置的不断改进和重装，他们的注意力就会逐渐分散，并将设计的基本原理忽略掉。他们虽然能因此有所收获，但是设计质量下降了。”（尼古拉·特斯拉. 特斯拉自传 [M]. 戴光年，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8.）

④ 这里以法语为例稍加说明。一方面，正如 Salhi (Salhi, Kamal. Critical Imperatives of the French; Language in the Francophone World; Colonial Legacy-Postcolonial Policy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3: 3, 317-345.) 所指出的，法语在法语世界中的作用必须放在法语国家本身对自己语言的重要性的关注的背景下，在他们与法国和独立后政府的关系中，而不仅仅是从后殖民的角度来看；另一方面，又正如赖特（苏·赖特.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 [M]. 陈新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19.）所指出的，这个时期“法语作为一种通用语得到传播，并不是因为说法语的人们着力不断推广它的缘故。人们之所以学习和使用它，是因为说法语的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影响力。语言的传播只是一个附带的效应。”

有的是以中文国际传播为主体，比如国际中文教育；有的则是以之为次要甚至更次要的目的，比如中国产品走出去，主体是卖产品，而以中文进行产品说明则是次要目的。

三、对九个方面的思考

下文的讨论，针对的是国际中文教育和中文国际传播这两个范畴在理论探索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主要涵盖九个方面。

（一）正当性之问

“为什么会有国际中文教育和中文国际传播？”这是一个元问题。

首先，这是人类不同群体^①之间接触和交流的必然结果。语言国际教育和传播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现实空间的和虚拟空间的）。语言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是一种公共产品。语言的公共产品属性体现在国家和全球两个层面，即中文既是中国的国家公共产品又是世界的全球公共产品。接触和交流都是双向的，从来就没有单向的，所以中文的国际教育和传播就是这个客观规律的一员。

其次，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结果。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明体系，^②不同文明体系在政经意等方面有着各自的特征，对于人类的未来有着各自的主张和探索。这些不同的主张和探索，需要语言来承载、表达和交流。中文承载着中国的主张和探索，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从未有过中断的文明和文字体系，浩如烟海的中文历史文献和历史智慧以及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人类未来发展提供着中国方案^③。

再次，这是世界了解中国和借鉴中国的必然结果。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开启了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期。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开始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在技术引进的同时也开始产能输出。世界越来越需要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市场，世界也越来越需要中国在新一轮的全球化发展中承担起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经贸关系的增长，国际关系的增强，人文交流的拓展，使得全球学习中文的需求激增猛进。历史上，中文、泰米尔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拉丁语等曾在13到16世纪的欧亚大陆上自东向西扮演着国际交际语的角色，法语曾经风靡世界，而现在英语则成为唯一的全球超级语言。这主要是由各语言的母语国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最后，这是维护和促进人类多元语言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专家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英语的全球强势传播，世界7000种左右的语言中有一半甚至更多面临消亡的危险，人类语言生态正面临着英语这一超级语言的严重威胁。国际中文教育不是要侵略其他语言的生存空间，而是要与其他语言和和睦相处、和谐共存，从而为维护和促进世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共同努力。

（二）时空“六力”

时间维度，是师法历史的借鉴力、透析现状的系统力、创建未来的想象力；空间维度，是现实虚拟的融合力、核心边缘的组合力、国内国际的互动力。

时间三力。希腊语、波斯语、梵语、拉丁语、汉语、法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英语等都曾在历史上或当前占据过区域或全球通用语的地位，^④对历史上主要语言国际教育和传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细致

① 以部落、族群、国家、机构或其他形式为单位。

② 比如汤因比、亨廷顿、基辛格、李光耀等都有过详细论述。

③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1）在系统论和系统学方面，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比之西方的还原论思维更胜一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与西方近现代文化思维优势的恰当结合，对系统方法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复杂性科学有望成为连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重要桥梁。”（郭雷·系统学是什么[J].系统科学与数学，2022，（3）：291-301.）（2）在数字经济领域，虽然起源在美国，但是目前发展风暴的中心却在中国，“其重要因素是西方精准化个体还原论思维不再适应新型信息生产力，而中国文化中的模糊正义和多元包容基因更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更具备引领这次人类社会转型的潜质。”（杨培芳·数字经济促社会转型的十三个趋势[A].信息社会50人论坛·变革与重建：数字化加速下的产业与社会[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189.）

④ 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M].章璐，梵非，蒋哲杰，王草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的而非粗疏的、系统的而非零散的分析,^①就是师法历史的借鉴力。通过整体性哲学^②来观照国际中文教育和传播,结构主义依然有效,但是更需要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和整体具有自身意义的理念从整体性和系统性着眼来探究问题,就是透析现状的系统力。“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则充盈世界。”^③想象力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基于现实条件和环境的创造性思考,比如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力量^④、全拼音教学的可能性^⑤等,就是创建未来的想象力。

空间三力。人类已经从文本、媒介和页面的数字化发展到人、地、物的数字化,不仅是符号和媒介的数字化,还有我们物理现实的对象和活动的数字化。这就是Web3.0时代^⑥,一个智慧空间网(the special web)逐渐成形的时代。^⑦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孪生、元宇宙、数字人、虚拟人等建构的虚拟世界已经在从辅助世界转化为平行世界甚至是一些人的主要世界,国际中文教育和传播应该更加重视这两个世界的融合力。汉字文化圈和东南亚地区是国际中文教育和传播的核心地缘所在,欧洲和非洲其次,澳洲和美洲处于边缘,但是核心和边缘显然是相对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整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核心与边缘的组合力需要重新认知。李泉等学者都分析过国内对外汉语教学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关系,在中文教育普遍当地化之前,中国的主体性作用依然重要,一些教学标准的国际化需要因地制宜,^⑧不宜一刀切,国内和国际的互动力是一个动态系统。

(三) 中国式语言国际教育与传播

所谓“中国式语言国际教育”,即充分探索中文作为二语教学的三大体系建设,创造性建构学科体系,基于中文事实来建构学术体系,建构中文教育和中文传播的新话语体系。创制和完善各类教育标准和指南,比如《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国际中文在线教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国际中文教育数字资源建设指南》等。宗旨就是建构基于中文的二语习得理论和实践体系。

所谓“中国式语言国际传播”,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语言国际教育和传播出现过许多模式,比如阿拉伯语等的宗教模式、法语和西班牙语、英语等的殖民模式等,而几十年来的中文国际教育与传播实践则建构起了一种和平发展背景下的合作共存模式。^⑨中文的国际教育与传播不是要侵略其他语言的生存空间,而是要与其他语言和睦相处、和谐共存,从而为维护和世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共同努力。正所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借用张维为和Coker^⑩的术语,这是一种文明型教育和传播模式,大致

① 当前的许多此方向的研究,大致有以下4种情形:要么粗疏而不细致,要么零散而不系统,要么细致而不系统,要么系统却又粗疏。细致而又系统的研究比较罕见。

② 金观涛. 整体的哲学[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埃德加·莫兰. 整体性思维:人类及其世界[M]. 陈一壮,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戴维·玻姆. 整体性与隐缠序:卷展中的宇宙与意识[M]. 张桂权,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③ Einstein, Albert. (1929) What Life Means to Einstein; An Interview by George Sylvester Viereck [J].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October 26, P. 17 + 110 + 113-114 + 117.

④ 王春辉. 新科技革命与国际中文教育[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2,(3):1-2.

⑤ 史有为. 国际中文教育全拼音教学的学理、构想与价值[J]. 语言战略研究,2022,(5):78-86.

⑥ 人类已经进入Web3.0阶段。Web1.0是静态互联网,Web2.0是平台互联网,Web3.0是价值互联网。Web3.0的核心价值是要构建一个去中心化、价值共创、按贡献分配的新型网络,而绝非是对现阶段互联网的简单升级。(朱嘉明. Web3.0是一种突变,一场颠覆[A]. 杜雨,张孜铭. 序《WEB3.0:赋能数字经济新时代》[M]. 北京:中译出版社,2022.)

⑦ 加布里埃尔·雷内,丹·马普斯. 智慧空间:揭秘Web3.0将如何连接人类、机器和人工智能,改造世界[M]. 徐镔,孔亚洛,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⑧ 尤其是这几年修订的或新制定的一些标准,比如《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等。

⑨ 王春辉. 历史大变局下的国际中文教育——语言与国家治理的视角[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50-63.

⑩ 张维为. 文明型国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Coker, Christopher. The Ris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可以将这种模式称之为“中国式语言国际教育与传播”模式。

中国式的模式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的。因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①这就使得中文的国际传播与英语的国际传播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正如基辛格所说：“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②“传经布道、有义务、传播其价值观”可以说是抓住了美国在全球进行英语霸权推广的核心。中国的国际中文教育，基本上是一种需求导向型的，即因为中外经济社会交往的需要，国际社会有学习中文的需求，而中国作为中文的母语国，有责任和义务为这种需求提供力所能及的供给。

（四）建构治理思维，开拓治理实践

一直以来，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都是被作为一种事业在推进。当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中文的国际传教育和传播亟须建构治理思维。

治理思维蕴涵的是整体性、系统性的方法论。治理思维有助于将教育和传播散落的因素进行整合，从整全性视角进行重新组构、阐释，从而有助于发现整体（而非部分）的功能。

国际中文教育治理和中文国际传播治理都可以依照语言文字治理的体系性分析进行，比如它们各自的目标体系、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以及本体治理和应用治理等。^③

（五）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

对于拼音文字来说，因为所写即所说，所以在作为二语习得时不太存在口语和书面语相分离的情形，有限字母的便利之下言文是一起习得的。但是对于汉字这类意音文字来说，文字与语音之间是分离的，二语习得者的习得是言文分离的，汉字是要单独记忆的。

中文的这种情形就带来了中文国际教育与传播的4种类型：（1）不会口语也不会书面语的；（2）只会口语而不会书面语；（3）只会书面语不会口语；（4）口语和书面语都会。第一类是不学中文者，后面三类中第四类是理想类型、第二类和第三类则是特殊学习者。现实中由于学习动机和目的等因素的不同，第一种和第二种的人数也不在少数。表示为表1：

表1 中文国际教育与传播的四种类型

序号	口语	书面语	涉及人群
1	-	-	非学习人群
2	+	-	对书面语无兴趣或无需求者
3	-	+	对口语无兴趣或无需求者
4	+	+	对口语和书面语都有兴趣或都有需求者

区分这四种类型，对于中文国际教育与传播来说可能至关重要。在此类型之下：（1）可以看到古代的汉语传播很大程度上是汉字的传播，其实就是第三种类型，“汉字文化圈”的称谓可谓精确，许多汉学家与此相同；（2）当代中文国际传播是口语和书面语的合力传播，所以更恰当的称谓是“中文文化圈”或者下文要论述到的“中文生活圈”；（3）大多数学习者所谓的“汉语难学”其实说的是“汉字难学”，即书面语而非口语的难学；（4）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国际中文教育全拼音教学的价值^④。

① 习近平. 中华民族血液中没有称霸世界的基因 [EB/OL]. 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15/c_1110712488.htm?isappinstalled=02014-05-15.

② 亨利·基辛格. 论中国 [M]. 胡利平, 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VI.

③ 王春辉. 论语言与国家治理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 29-37.

④ 史有为. 国际中文教育全拼音教学的学理、构想与价值 [J]. 语言战略研究, 2022, (5): 74-86.

(六) 精准化导向

站在大变局的历史关口,中文国际教育和传播需精心分析长远趋势、仔细研究战术选择、冷静探讨行动决定。进入4.0时代的国际中文教育需要管理、人员结构、研发、供应链等所有方面,精准化思维、下沉细化、提质增效。中文国际传播则要一国一策,国别和区域化研究要跟上,^①要全面而系统地掌握目的国基本资料。

除了当地化、低龄化、标准化、职业化等讨论较多的论题之外,下面几项精准化工作亟须提升。

(1) 注意华文教育的特殊性。郭熙等诸学者一直在呼吁,华语文教育是一种祖语教育,有历史上的血缘和语缘关联,与面向非华裔二语学习者的中文教育有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也是明显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华语文教育统摄进国际中文教育的大框架内,无可厚非,但是必须要认识到华语文教育的特殊性,需要华文教育的精准。

(2) 注意“中文+”和“+中文”的互补性。两个短语具有认知上的象似性,即“中文+”指的是习得中文之后进行其他发展,目前提的最多的是“中文+职业”;“+中文”则指的是在现有工作和相关状态基础上进行中文学习,尤其是专门用途中文的学习。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说,“中文+”更强调中文的核心地位,而“+中文”则显得中文处于从属地位。这种社会心理以及其他因素的合力,就使得近几年“中文+”成为各方追逐的热点,而对于“+中文”则较少顾及。但是事实上对于中文的国际教育和传播来说,二者都是重要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中文”才是真正具有巨大空间和潜力的方面^②。将“中文+”和“+中文”进行精准区分,进而才能进行精准施策,从而达到二者的互补。

(3) 区分中文进入目的国国民或基础教育体系的不同类型。通常说来,进入的方式主要有4种:1)目的国自主设计,中方不参与;2)目的国为主体,中方参与;3)中方为主体,目的国配合;4)目的国与中国的双主体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可在此类型区分下进行细化分析,为不同类型提供贴合各自实际的实践路径。

(4) 增强中文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如文章开始所述,目前中文是十多个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全球治理作用的进一步提升,这一趋势也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对于中国主导或主要资助的国际组织,尤其需要在认知和实践两端进一步提升中文的地位和使用。

(5) 优化教育和传播的地域化和领域化布局。从地域化的视角,东亚-中亚-东南亚的汉字文化圈和其他地区利益攸关的地缘政治圈是国际中文教育的两个核心地带。^③亚洲是中国所在区域,其核心地位毋庸置疑;对于其他区域,一方面要注重政治经济上跟中国有较好关系基础的国家,通过单向或双向的方式,继续将国际中文教育纳入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④另一方面可以注意在英语还未侵入或者对英语等语言持消极态度的国家和地区重点布局。任何语言的国际传播都是领域化的,比如法国在15~18世纪的国际传播就是从宫廷语言、外交语言等领域慢慢传导到行政语言、文学语言甚至大众家庭语言等领域的,中文的国际传播也不例外,比如航空领域、电力领域、电子商务领域、高铁领域等。

(6) 做好外派师资的体系完善工作。进一步优化外派流程,提升外派人员素养,加强外派人员安全保障,加大激励措施和奖励力度,打造一支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队伍。做好中文志愿者宣传,提升相关工

① 这些年国际中文教育和语言传播的区域国别研究成为热点之一,但是应注意避免研究的同质化和浅显化。未来需要话题下沉、以点带面来推进,比如法治建设的区域国别分析、数字化转型的区域国别研究等。

② 比如近期比较火的太空航天员秀中文或学中文的情况。

③ 王春辉. 历史大变局下的国际中文教育——语言与国家治理的视角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 50-63.

④ 比如在习近平主席受邀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期间,12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利雅得王宫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教育部中文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在内的合作文件文本交换仪式。这是继2019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宣布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后,进一步加强中、沙中文教育合作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双方将在深化合作内容、拓展合作领域方面迈上新台阶。(教育部语合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GWq88NOqXzATgoVhKaJF_Q)

作的社会受众面和社会威望。在事业的起始阶段，在当地化得到较好实现以前，只能靠国内的优秀人才外派，这是个长期战略，不可能一蹴而就。

(7) 讲好三个故事。“讲故事其实是人类对进化的适应”^①“能讲故事和讲好故事关乎我们的生存”^②。当前，用中文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一时流行。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故事也要讲好，即用中文讲好本国故事、用中文讲好人类故事。吕玉兰、王春辉^③详细论证了在重视中文二语学习者“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应重视他们用中文讲好本国故事、呈现当地文化的能力。而用中文讲好人类故事，则是中文承担起更大区域通用语、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必要构件。

(七) 宏观调控和市场逻辑辩证统一

宏观调控和市场逻辑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这一点适用于国家治理，也适用于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的事业和治理。语言国际教育和传播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活动或事业，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文国际教育和传播主要是宏观调控主导的话，那么在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和线上教育崛起等多因素的作用下，当前和未来需要更加注重产业化、市场化的主体性作用，提升市场逻辑的功能，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做好。

要想市场化和产业化在事业发展和治理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第一步要做的可能是要解放思想、观念更新。正如“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为改革开放解放了国人的思想包袱一样，在宏观调控不放松的同时，要给市场逻辑以客观评价和客观地位，充分发挥其“抓老鼠”的作用。

从供给侧来说，供给侧优化应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定位供给主体的不同职能，既注重社会效益，也重视产业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的发展路径至少包括：丰富中文作为公共产品的多类型、多层次供给，不断激发国际中文教育和传播的市场活力，持续提升国际中文教育和传播系列品牌传播价值，充分借助现代科技和传媒优势为国际中文教育和传播赋能等。^④

尤其需要发挥企业的特殊作用。“中文+职业技能”和“职业技能+中文”的展开需要各种职业企业的参与，线上教育和传播更是需要一批企业的参与来满足市场需求。随着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出去，亟须提升企业在中文国际传播中的作用，语言跟着企业走，提升跨国企业的语言战略意识和实践，涉外的各行各业在制定工作规划时，在制定从业人员素质标准和培训考核规划时，在制定产品的质量、检验、推介和售后服务等工作准则时，应当充分考虑中文的维度，在各个环节考虑并实践中文的传播。

从需求侧来说，需充分调研全球学习需求，精准定位和分析需求人群，在普及和提升两端用力。所谓“普及”，即大力开拓需求市场，将一些国家和地区尚未发现的需求挖掘出来，比如那些由于分散在各地域各行业而无法获取中文教育机会的人们，随着新科技的提升和线上教育的发展将获得机会；所谓“提升”，即在已经有了较好发展基础的国家和地区捕捉中文提升的需求市场，比如商业精英、汉学家以及各级学生等。

(八) 中文语言教育和传播与中文语言使用和生活

李宇明在多个场合和多篇文章中都呼吁，“教人学汉语，是为了让人用汉语。教和学是手段，学了汉语能够用汉语、用好汉语、过好汉语生活，才是目的。”^⑤目前的情形是对于全球中文语言使用和生活关注还比较少，比如区域国别视角的中文语言生活是什么样子，全球中文的主要使用领域是哪些，中文学习者的语种库情况和不同语境下语言选择使用的情况如何，在华国际移民的中文学习需求和使用状况

① 加亚·文斯. 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 [M]. 贾青青，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98.

② 王笛给《人类进化史》一书的推荐序。

③ 吕玉兰，王春辉.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建设途径探析——聚焦二语学习者用中文讲好本国故事 [J]. 江汉学术 2022, (6): 93-100.

④ 惠天罡. 国际中文教育供给侧优化的理论依据与发展路径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1): 86-95.

⑤ 李宇明. 漫谈汉语国际教育：未来之路 [Z]. “汉语堂”微信公众号，2018-06-01.

如何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借鉴中国“语言生活派”的研究范式进行考察。

(九) 踔厉数字化与新科技助力

“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① 在经历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人类已经进入了数字社会。数字社会,是与数字经济相匹配,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基础之上,以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迭代发展为时代特点,以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技术突破为核心要素,在家庭、工作、教育、娱乐等场域采用和整合信息通信技术的社会形态。如同历史上录音机、电视、电脑、投影仪等新技术的发明给语言教育的助力一样,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智慧教室等数字技术也正在给国际中文教育和传播的各个方面赋予新的能量。

随着科技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提升,科技也成为影响语言教育和语言传播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人类正处在第五次“康波”^②的末尾和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前奏,以量子科技、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石墨烯等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必将对语言教育和传播产生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对于国际中文教育和中文国际传播来说,亟须抓住机遇、提前布局、系统建构、规划发展。^③

四、结 语

跟地球上的其他许多大语种一样,中文的国际教育和传播也构成了一个体系。体系是“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中文的国际教育和传播体系至少涵盖了价值观念(秉持的理念等)、内部结构(比如传播学上的“5W”要素)、功能效果(带来的各种效应等)、内外评价(比如中文作为二语学习者怎么看待)。创新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但显然“抛”不可能彻底,“创”也不可能完全,而是带着历史时空的枷锁。事实上创新不是执着于新旧之争,其本质是“更适应条件”和“更符合要求”。“条件”和“要求”就是具体时间与具体空间交汇而形成的具体坐标点。

国家的强大并不必然带来语言的强大,经济强国并不必然造就语言强国。当前的中文,跟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大语言来说,在国际传播这一块是弱势的一方,所以在事业发展的心态上,一方面不能用近20年的成就以自满,另一方面不能把国家的强盛泛化到语言的强盛。

Nine Problem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WANG Chunhui

(Language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89)

Abstract: Despite tremendous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lthough we can take pride in achievements we have made, there are some challenges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 When analyzing problem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rinciples of Time and Space, and Principles of Subjectivity and Relativity. The current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urgently need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rovements from the following nine aspects: the legitimacy; the “six forces” in Principles of Time and Space; the Chinese-styl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think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ance practices;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written and oral language; the orientation to precisi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macro-control and marketing logic; the daily us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intensive digitiz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assistance. With no intention to criticize the previous findings, the discussion o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aims to “adapt to the conditions”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better.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are specific coordinate points lying on the intersection of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style; language governance; digitization; marketization; nine problems

(责任编辑:杨 恬)

① 尼古拉斯·奥斯特勒. 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M]. 章璐,梵非,蒋哲杰,王草倩,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29.

② “康波”全称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苏联康德拉季耶夫考察了资本主义世界两百多年的近代史,发现他们的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周期性,每次差不多都是40年到60年,而且每轮周期都是技术驱动的。

③ 王春辉. 新科技革命与国际中文教育[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2,(3):1-2.